

# 中文新世纪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社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社长:原 源 冯海敏 吴林华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2日

■ 团宣准字:09-0240号  
■ 指导老师:黄彦菲  
■ 主编:吴静怡 梁文婷 许林云  
■ 网站: http://www.zwxsj.com.cn  
■ 总第 106 期

## 本期导读

- ◆ 李萌昀: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
- ◆ 杨联芬:《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
- ◆ 程光炜:1987 结局或开始:读池莉小说《烦恼人生》  
详见第二版
- ◆ 本届文学节精彩语录,领略名家微言大义  
详见第三版
- ◆ 孙柏:《云图》——历史与革命的路线图
- ◆ 常江:好莱坞电影的文学改编传统  
详见第四版



## “回归阅读”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七届文学节成功举办

春风送暖,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成功举办了以“回归阅读”为主题的第七届文学节。

一年一度的文学节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品牌活动,经过了连续七年的开展,其活动日臻成熟。首届文学节于2006年隆重举办,包括学术讲座、创作论坛、名人故居游、文化会馆参观等一系列项目。近年来,在学校师生的热心建议和各级学生组织的积极参与下,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团委学生会积极创新、周密组织,为文学节开创了诸多新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文学沙龙和读片会等,使文学节日趋丰富,从而将其逐步打造成了当下文学院的经典学术活动。如今,文学节以其鲜明的人文特色和广受欢迎的活动形式吸引着越来越多其他院校师生的广泛参与,它不仅满足了文学院学生的专业需求,又成功地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推广,普及了文学知识,传递了人文精神。

上一届文学节以“文苑含英,学以致用”为主题,活动主要包括系列讲座、诗歌交流会和青春文学沙龙三个部分,倡导同学们研读人文经典的同时注重自身学术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提高。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获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本届文学节响应冯惠玲校长讲话中关于实施“读史读经典”项目的号召,确定以“回归阅读”为主题,意在倡导人们保持对文学的初心,回归真实的文本阅读,引导广大人文学子以更加真诚的姿态重新品鉴那些逐渐远离我们生活的经典文本,再次领略文学的精粹和真谛。在这个“回归阅读”的过程中,那些曾经令人感动的文字再次带领着同学们在纷乱喧嚣的俗世中去探索出一条清晰明朗的精神脉络,进而为自己的心灵觅得一方净土。正是秉持着这种理念,文学院在吸收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兼顾活动深度和大众需求,努力提升文学节的质量,为人大师生奉献出更多更精彩的活动。

在本届文学节中,文学院邀请到刘小枫教授、程光炜教授、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孙柏副教授、著名作家冰童等,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同学们在这些学术前辈的带领下再一次领略到文学的无穷魅力。借文学节这一学术平台,展现了我校文学院对于纯文学不懈坚守的信念,而且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阅读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和接受教化的唯一途径,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以其更具有竞争力的特色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如何面对来自影视方面的竞争,做到回归阅读,是本届文学节讲座的重要内容。

新闻学院的常江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好莱坞电影的文学改编传统”讲座中,他点出在好莱坞生产的优秀电影

的活力。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视阅读的必要性,回归阅读始终是人类精神自我补给的重要途径。同样,在我校文学院副教授孙柏老师给大家带来“《云图》——历史与革命的路线图”的讲座中,他以批判性的眼光深入分析电影版《云图》与原著间的差异,提出我们应摒弃为了“尊奉经典,膜拜权威”回归阅读的思路,而应以重新回到语言文字这种思考媒介为出发点,体

校国学院老师李萌昀给大家带来的“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讲座中得到了回答。讲座中,他带领听众重温了朱熹的古典阅读范式:居敬持志、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与着紧用力。以朱熹为代表的男性儒家学者面对印刷时代的来临造成的一些具有冲击性的变化:书籍种类增多,书的标准化、印刷体的诞生以及人与书的疏离,“以传统精神规训现代前夜躁动不安的个人”。而以金圣叹为代表的现代阅读萌芽,包括新的书籍等级、新的阅读仪式。新的书籍等级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偏好,例如金圣叹将小说与《庄子》并列;新的阅读仪式也是个性化的,例如“雪夜闭门读禁书”体现出的私人阅读、无声阅读、自由阅读和惬意阅读。

面对印刷时代的到来,朱熹和金圣叹分别采取了消极回避和积极接受两种态度,而面对电子阅读时代的到来,当下读者们应该如何去做呢?李萌昀老师强调了我们需要保守的几点来自旧时代的价值:人与书的亲密关系、关注书的物质形态、重视阅读行为本身,提倡丰富的阅读形式、经典阅读与敬畏文字。在迎接新时代到来的同时不能将优秀的传统抛弃。

除了以上几场讲座,本届文学节还举办了国内首次关于木心先生的讨论会,由文学院院长孙郁主持,陈丹青等艺术家、学者、媒体人围绕《文学回忆录》发表了对木心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的评价,探究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积极回应。而刘小枫教授关于“古典与后现代诗学”的探讨,程光炜教授重读池莉《烦恼人生》,杨联芬教授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等也给广大人文学子带来了一场文学盛宴。

对于这次文学节,许多参与者表示收获良多,非常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宣传力度不够,讲座、活动信息传递不及时等问题。流年虽换,然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学始终薪火相传,本次文学界号召广大师生回归阅读,相信会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为大家寻觅心灵的皈依开辟出一条璀璨的道路。

(本报记者:孙敬一)



中,文学改编作品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最经典”的影片中,文学改编占据一半左右的数量,此外,热衷于文学改编的电影导演,很多具有欧洲文化背景。优质的文学作品始终是电影产品的根基,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素材。文学改编电影的策略即是印刷文明的视听化,将意义的生成路径缩短,将抽象理念感官化、对人物做典型化处理以及强化受众的自我投射和身份想象,文学作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通过这种转化焕发出新

会语言文字领域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基于这一点来看,原著和电影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二者都可以开启思考空间,对我们被封闭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文学作品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当下影视创作大潮之中,回归原著的阅读将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加传统、原汁原味的享受,同时也将加深我们对相关影视作品的理解。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阅读时代的来临,读者应该采取怎样的阅读方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

## 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

### 座谈会

2013年3月31日14:00,我院文学节系列活动之“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座谈会在公共教学三楼3101教室举行。参加座谈会的嘉宾有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中国美术学院曹立伟教授、我院程光炜教授和杨联芬教授、青年评论家李静女士、著名学者垆菲先生、上海财经大学马宇辉副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许志强教授、青年学者岳建一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南方周末》记者朱也旷先生,我院院长孙郁教授担任座谈会主持。不少外校同学、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本次座谈会通过讨论《文学回忆录》这部作品来分析、阐述“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文学回忆录》是由陈丹青先生5年的课堂笔记整理所得,体现了其老师木心先生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独特讲述方式。

座谈会开始,孙郁教授简要介绍了主讲人身份,并称《文学回忆录》这部3个月销量突破12万册的文学作品以独特的写作方式,颠覆了泛艺术形态化的文学,并让人深思当今文学史的教学、研究是否真的出现了问

题。这之后,由各位主讲人自由发表看法并进行深入地讨论。

垆菲先生十分开心地致开场白:“久违这样的大学课堂,十几年来又一次出现了。”他认为,随着研究木心的学者日益增多,将来很有可能出现新的一次文艺复兴。甚至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微型的文艺复兴,他还表示对这样的情形十分看好。

而曹立伟教授不无悲痛地表示,其实从2006年木心先生的第一部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大陆出版,到前年木心去世,他长期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而如今小小的“木心热”,只是阅读的开始。在深入阅读的前提下,探讨木心先生是是被高估还是低估的问题言之过早,能否使文学的可能变成现实仍是一个谜。

许志强教授引用木心的诗句,从音韵的角度说木心先生的诗歌韵律是清脆协调的,对汉语语言的表述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实验,文言和白话的自由拼接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开拓性。而木心先生关于世界文学史的讲述方式,使得文学史的讲述回归本

题,回到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上来,这是他灵魂与精神上的冒险,借此他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史的讲述如何成为精神的助产术。

张柠教授被认为是发“另一种声音”的人,他的言论被媒体解读为“木心被高估”。在张柠教授看来,文学有轻的语言和重的语言两种类型。相比之下,台湾作家的许多作品是与我们的生命和性灵有关的,是时下许多年轻人喜欢的轻的语言;而大陆的作家常常选择宏大的革命主题,则显得“重口味”一些。而木心先生的作品却是带有轻语言的纯粹的美感的。谈到文学史,张柠教授认为它是趣味性和科学性的矛盾,往往人云亦云,缺乏独特的创建。文学史的写作以传统的观念删除了许多作家。然而木心先生用审美批判的方法胀破了革命启蒙的框架,找回了被精英观念删除了的大众所需的基本观念。

垆菲先生后来又谈到,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木心的作品不免太局限了,木心的贡献不仅在文学,他体现出的宇宙、世界、人生的三观正契合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陈一家之言”的观点。

之后,岳建一先生也表示,木心的语言把各种语体全部打碎,不论是诗、词、赋,还是文言、散文……他那非常干净、清澈却让人感到深不见底,回归了春秋文学的特点。同时他的作品也体现了他对哲学、宗教和各国人文、生态的了解,具有深刻的洞察性与独到的见解,显示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杨联芬教授则称赞木心的作品“让文学回归文学,找寻最初的本真”。马宇辉从木心的《诗经演》讲到文学史的表述方式,认为文学史在于组合,在于主观看法与认识的组合。朱也旷先生说木心先生是用以点带面的手法,从个别作家人手来讲述世界文学史。

而后,李静女士较为感性的谈到她与木心先生的相识。她说木心先生一直坚持哲学的唯物,他的俳句“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体现了他独到的见解:生命必须要有理性,而理论必须要绿色的。

接着,在听众的热烈欢迎下,陈

丹青先生表达了他对帮助木心之梦的朋友的感谢。他说木心先生是一辈子受嘲讽的人,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让木心先生的作品在他的母国出版,也感谢孙郁院长等学者能够让木心先生的作品第一次在母国的文人圈被讨论。同时也借用李静女士多年前的话“木心到现在只是出版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表达了他对木心一个“八十多岁的新作家”的悲伤,但他认为现在正是一个开端让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去认识、去接受木心,让文人圈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去讨论木心。

主讲人发言结束后又有许多听众热情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讲述了自己关于木心作品的看法。

到17:00,本次座谈会圆满结束。

李萌昀：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

2013年4月13日，我院“回归阅读”第七届文学节第六场讲座“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在公共教学三楼3204教室举办。

讲座的主讲人为李萌昀老师。李萌昀老师从1999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8月至今，他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小说、古代戏曲、明清文学，并开设“红楼梦研读”“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等课程，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李萌昀老师以风趣的开场白开始了她精彩的讲座，并明确了这次主题，即从古代的阅读状况对当今阅读状况进行诠释和批判。

李萌昀老师用提问的方式进行了现场调查，与同学们进行互动，由此引出了当代阅读状况的第一个特征——电子阅读时代来临。李萌昀老师同时阐述了电子阅读的三个方面：整体感的消失、互动的减弱和电子书的品类泛滥。第二个特征是书店的快餐化，破坏了书的整体感。第三个则是现代“阅读法”，比如“快速阅读”法，现实的快节奏造成了这种过于急切获得知识而不顾阅读实际的现象的泛滥。在阅读状况中，他最强调的是阅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即你是怎么读书，而不是读什么书。

随后李萌昀老师带领听众重温了朱熹的古典阅读范式：居敬持志、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与着紧用力。他详细阐释了每一个要求的具体内涵，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朱熹为代表的标准的古典阅读范式是男性儒家学者阅读儒家经典的方式。他认为，朱熹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是印刷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一些具有冲击性的变化：书籍种类增多、书的标准化、印刷体的诞生以及人与书的疏离。朱熹的阅读范式即是在面对这些变化时，“以传统精神规训现代前夜躁动不安的个人”。

与朱熹的古典阅读范式截然不同的是以金圣叹为代表的现代阅读萌芽，包括新的书籍等级、新的阅读仪式。新的书籍等级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偏好，例如金圣叹将小说

与《庄子》并列。新的阅读仪式也是个性化的，例如“雪夜闭门读禁书”体现出的私人阅读、无声阅读、自由阅读、惬意阅读。

接下来，李萌昀老师介绍了明清时期的阅读个案。他在此举了多个例子：阅读《牡丹亭》、《西厢记》与《红楼梦》，以及《红楼梦》中的阅读现象。实际上，这些个案是与金圣叹的阅读方式一脉相承的。

通过两种阅读方式的对比，李萌昀老师得出一个结论，即面对同样的印刷时代来临的挑战，朱熹与金圣叹分别采用了回避与迎合的方式。如今我们处在阅读方式从印刷到电子的历史转折点，也要直面新的时代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至此，李萌昀老师又带领听众回到了开场时提出的问题：电子阅读时代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办？李萌昀老师提出需要有人像朱熹一样守护过去，也需要有人像金圣叹一样迎合未来。而就他个人来说，他倾向于前者。他强调了我们需要保守的几点来自旧时代的价值：人与书的亲密关系、关注书的物质形态、重视阅读行为本身、提倡丰富的阅读形式、经典阅读与敬畏文字。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是听众提问环节，大家十分踊跃。问题主要有怎样选择应该阅读的书籍、怎样从书籍中获益与怎么看待应对国学热等。对此，李萌昀老师的解答是我们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逐渐的阅读脉络，我们会逐渐知道自己应该读什么、适合读什么。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需要功利地去记什么，从中获益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对于国学热，要冷静，要以当下的立场面对经典阅读，从国学中获得改变当今社会的力量。

李萌昀老师通过阐释朱熹与金圣叹所代表的两种阅读范式，展示了在阅读方式转型时期出现的不同应对方式，进而阐述了再当下电子阅读流行的趋势中我们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当持有的阅读态度。至此，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本报记者：李珊珊)



我院文学节讲座之《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

4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杨联芬教授在公共教学三楼3104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的文学节讲座。以《小团圆》为线索回顾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读者对张爱玲的认识和了解其实几乎全部来自她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在《私语》、《童言无忌》、《烬余录》在这些作品中，张爱玲用平和的语句道出了她并不那么幸福的成长经历。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然而在这令人欣羡的显赫家世背后却隐藏着张爱玲数不尽的心酸。张爱玲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但现实像冰凉的匕首毁掉了她的梦。她的母亲常年居住在海外，父亲又是一个烟鬼，对张爱玲和弟弟缺少足够的关怀，而后来父母的离异又给她带来了难以平复的悲痛。杨教授认为，父母离婚这件事可谓是张爱玲一生不幸的源头，缺少母爱和父爱的她，已然不完整，然而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她更为

敏感、细腻，对世态炎凉的切肤体会渗透在她的写作中，凝结成张爱玲特有的苍凉。

随后，杨联芬教授谈到了张爱玲和她母亲的关系。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过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追求自由，裹过的小脚依旧经常穿高跟鞋，而父亲却是一个旧思想浓厚的腐朽家族的卫道士，整天抽大烟，生活晦暗，性格存在天壤之别。张爱玲的母亲，她曾因为母亲喜欢钢琴而去努力去学习钢琴，因母亲对老舍的《二马》爱不释手而视《二马》为自己最喜欢的老舍的作品，她只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与母亲的契合点。有一次，母亲从国外回来，她竟然高兴得给自己的好友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稿纸的信，那段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是张爱玲自打有记忆以来最惬意的日子。

后来父母离异，因和后母吵架遭到父亲的毒打，在一场大病之后她逃出父亲的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

的母亲，在她眼里，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但是后来她对母亲的感觉却发生了改变，她在《童言无忌》里曾说：“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折磨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折磨着，这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地毁掉了我的爱。”再后来，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一位老师资助给张爱玲的学费，为了这件事，张爱玲恨了她母亲一辈子。

在讲座中，杨联芬教授提到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疗法，而张爱玲用小说的方式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讲述出来，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教授说道，在小说中，她可以有虚构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安排人物的出场，语言和表情。而这些虚构的情节，倘若不是真正经历过，又怎么会写出那么真实的感受呢？所以，小说是最接近真实的虚构。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有同学向杨联芬教授问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有两个人不能

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请问您怎么看？”杨教授回答说：“其实也不是不能提，只是鲁迅被提的已经很多了，而张爱玲似乎是一个禁区，其实张爱玲是一个具有真性情、很率真的一个人，她不太关心政治，她讽刺日贵族家庭的腐朽生活，她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能提，其实，对张爱玲的阐释空间尚大，目前很多研究她的人并没有看过她的《小团圆》，对她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层面，所以还可以继续研究。”

杨联芬教授以《小团圆》为例简要地回顾了张爱玲的一生，根据她不幸的成长经历探讨了解释张爱玲作品中苍凉根源的所在，再次强调和深化了“回归阅读”的主题，为本次文学节画上圆满的句号。

(团委供稿：李芙蓉)



程光炜：1987结局或开始——读池莉小说《烦恼人生》

2013年3月26日，文学院程光炜教授带来的讲座“1987结局或开始：读池莉小说《烦恼人生》”在公共教学三楼3305教室准时开始。程光炜教授首先介绍了当代文学的主要类型，着重介绍了伤痕文学以及新写实主义文学。其中，伤痕文学以批判文革和批判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因而其中充满了眼泪、痛苦、牺牲、离别和重逢，而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末繁荣起来。解放后前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崇尚英雄主义，远离了生活实际，但经过文革的教训以后，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谋划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由一个“革命”的社会逐步转变为日常的社会，教育、文学也随之而变：从以英雄文学为主转向以“小人”文学为主，从死抱住一个崇高的理想不放，转向更多

地关注日常物质生活。程教授随后介绍道，池莉是新现实主义作家中的“一员大将”，她擅写城市生活，尤其熟悉武汉市民生活，其小说《烦恼人生》的主人公便是武汉某钢铁厂青年职工印家厚。印家厚当年也是热血青年，但结婚后，每天带着儿子从汉口乘轮渡到武昌上班，陷入家庭琐事中而不能自拔。生活压力使他放弃了理想，在如花似玉的女徒弟雅丽的追求面前也唯唯诺诺。他的理想只剩下用奖金给儿子买昂贵玩具和分一套房子来改善困顿的生活处境，但这一切最后全部落空。他意识到即使万般无奈，生活也得进行下去。小说的内容只有短短几千字，描写的也不过是印家厚无比平凡的一天，但短短的一天，却折射出了80年代中

后期社会的转折与变化。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重新成为普罗大众生活关注的焦点。我们的“烦恼”就由此产生。这些“烦恼”时至今日还盘旋在人们心头。此外，程光炜教授还分析了作者大量篇幅描写印家厚在车上及轮渡上往返住所和工厂这一情景的目的。1979年前后，许多“归来作家”、“知青作家”都从历史浩劫中“归来”，返回到城市中。与这些英雄般归来的作家相比，印家厚只是一个小人物，为了谋生每日碌碌奔波。这奔波肯定不是困在世俗者与文学青年之间的工人印家厚想要的生活。印家厚是当代中国人典型的“灰色中年”的缩影。像印家厚这种有过人雄心但最后因错过机遇而落魄的中

年人，像他这样生活社会底层和早被轰隆隆而过的历史列车抛弃在原地的中年人，就是中国普普通通的拖儿带女的男男女女。中国这十多年的巨大进步，就是以成批地生产这种失意落魄或堕落的人群为代价的。车和渡轮代表巨大的迁徙量，反映了社会的蓬勃活力，它们实质是一个历史隐喻，是这个剧烈转型时代的一个载体，“在路上”，这句话深刻概括了一个不能忘却的年代。池莉用作家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用其独特的语言入木三分地记录下人们在某些历史瞬间中不可遗忘的所作所为。她的语言干净利落，生动形象，善于描写印家厚生活中温馨的、有人情味的细节。在这点上，新写实文学与伤痕文学有很大不同。伤痕文学极少有生活细节，即使

有细节，实质也是个大的隐喻，它们实质是英雄主义文学的尾声，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讲述的是大故事，而非柴米油盐的生活。程光炜教授用《天云山传奇》与《烦恼人生》作对比，进一步阐释“结局与开始”的意义。《天云山传奇》是安徽作家鲁彦周于1979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典型的伤痕文学。主要讲述50年代的女大学生宋薇（后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同学兼男友罗群被错划右派，她不愿意地嫁给年长的地委书记吴遥。二十年后，她在清查冤假错案时发现，罗群落魄后竟在安徽天云山山区做了多年的马车夫。这使她的感情天平发生了惊天逆转。虽然丈夫极力阻挠，她还是冲破家庭的罗网，去追求与罗群失而复得的爱情。

《天云山传奇》和《烦恼人生》指向不同的年代的不同历史事件，分别为1979年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和1987年工厂进行奖金分房。年龄相差29岁的两位作家，虽然可以在同一个时代里创作，却有可能是在两个时代思考着他们不同的人生。从1979年到1987年，短短八年，但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好像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烦恼人生》写的是1987年前后中部大都市武汉的社会一角，这一年像一个翘翘板似地横跨着两个时代，它是结束，也仿佛是开始，把中国社会这二十年做成一个微缩胶卷存放在北京图书馆的特藏书柜中。

(本报记者：谭玮)



# 「文学节·精彩语录」

## 孙柏： 《云图》——历史与革命的路线

“重新回到文字，回到语言文字这样一种思考媒介当中去，实际就是在语言文字的领域中留有足够的沉思的空间。而这种沉思的空间恐怕是被今天这种过度膨胀的影像的、视觉的信息所剥夺、侵蚀了的。”

“我们的阅读是肯定要有个选择，而这个选择点到底在哪里？我们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基于怎样的一个指导方向去读书？所以我认为那种尊奉经典、膜拜权威的读法是完全不可取的。茉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的那种‘回归阅读’恰恰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这个方向并不一定就和影像的、电影的等视觉的文化相冲突。实际上，她所表达的是，当我们回归阅读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开启一个沉思的思考空间，尤其是这个沉思的思考空间由语言、文字这样的一种象征，这样一种符号对我们的被遮蔽了的历史记忆进行勾陈。这本身是开启一个新的希望空间的可能。所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回归阅读’，或者用克里斯蒂娃的话来说，‘向后回归’，才是有意义的。”

“整部影片的关键点在于光与火，在一个命定的，看起来是亘古不变的‘云图’的象征、映照和预示之下，人如何投入他们的热情，投入他们的思考，投入他们的那种心灵的火花。”

“在我们所有这些个体都板平的局面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名字，需要有一个绝对的象征，来作为一个统和性的唯一力量……中国有这么广阔的幅员，当代中国的整个运作，在这样一个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一个极度的社会分化的过程中，我们之所以还能够维持中国没有四分五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不只是毛泽东，还有一系列这样象征性的、统和性的存在。”

“在整个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里生成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仍然保留着六十年代的很多的思想资源：革命的理论资源、话语资源；但在另一方面，在六十年代尤其是在西方的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个人和个人主义的抗争。而这种抗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到整个六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已经消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犬儒主义的一种后时代结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非常琐碎的个人的反抗。”

## 李华：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 ——体验自由写作

“在自由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思虑重重，只是把自由写作当做我们应得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用来向别人展示的，而是凝结着我们很多经历体验的。我每次看到自己的东西都很感动，甚至会流眼泪或大笑一阵，觉得当时的感觉都回来了。我相信自由写作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心得到自由，不管你有名还是无名，别人是夸你还是批评你，都不重要。”

“我们对写作的要求和期望值是非常高的，我可以随便说话，但是写作确实不能随随便便的，一定要真实，完全表达我心里最深处最美好的想法。”

“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对自己吹毛求疵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挣扎过。这也是个不停释放自己的过程，也是个像呼吸一样不停联系的过程。千万不要给写作一个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的位置，这只会增加你的痛苦，如是而已。”

“自由写作的第一要义就是让你得到自由，像你呼吸空气一样自由。所以如果课堂给你太多限制，第一第二第三，让你不自由，那么这个写作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所以我想为什么自由写作这么重要，就是人心里东西一定要表达出来，否则你会得抑郁症或其他病症，尤其对于我们做教育的人来说。”

“我回国也有过思考、挣扎。我当时就想我是愿意在好莱坞待着还是回国。我想明白了，我愿意回国做一个像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因为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好莱坞的影片哪怕再好，拿了奥斯卡奖，让你看了感动得痛哭流涕，你看完后还是该干嘛干嘛，不会过多地想起。而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真实的。我感觉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这些疼痛、复杂的经历促成了我的写作之路。”

“手写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心手相连，而电脑毕竟是一个外界的没有生命的机械。其实写作和修改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有些人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就是同时在写作和修改，他的速度就会奇慢无比，他的思想火花也就出不来。”

## 刘小枫： 古典与后现代诗术

“《诗学》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作诗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非常著名的‘作诗即模仿’论。模仿是所有作诗最基本的性质。作诗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分为静态的、空间性的模仿和动态的、时间性的模仿。比如，雕塑属于空间性的，静态的模仿；舞蹈、戏剧、小说叙事就是动态的、时间性的模仿。”

“人的一生和模仿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严格地讲，的确，人的一生就是在演戏，你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这个戏里面可能会有大大小小的过错，但是当你在生活中不读文学作品，你就没有一个反省的机制，那么当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看到作品中人生所犯的明显的过错，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感叹自己不会犯这样的过错。这就是文学写作与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差距。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剧，其实只是说对了一半，差异就在于，文学在模仿的时候必然要夸张，而人生不会。”

“既然悲剧的独特性在于最能够激发辨识高尚和低俗的一种理智，以及理智的德性，于是悲剧比喜剧更具有教育作用。喜剧仅有可笑的行为，而单纯的悲剧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但是古希腊它却不同，它民主时代的背景就混杂了人的是非过错。因此，实际的人生行为大多既非高尚低俗泾渭分明，也并不是仅仅可笑的，而是高低混合。所以悲剧最能够凸显实际人生道德上的含混，这也是悲剧最有看头的原因所在。”

“《玫瑰之名》问世仅仅六年，全球销量达到四百万。可以说，这部小说在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国家无不被誉为最佳小说。由此我们可以说，有了艾柯这样的德性，有了他这样的智慧，在他努力建构的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如果低级、庸俗、可恶的、反面的东西压倒了高尚的东西，严肃的东西、高贵的东西荡然无存，我们当然不会觉得稀奇甚至更不会觉得可笑的，但是反过来讲，这个对我们的写作，那就是刚好是一个建造。”

## 李萌昀： 从朱熹到金圣叹——重温古典阅读

“在纸质书时代，如果喜欢书中某句话，我可以在下面划一行，划一个横线；我有一个感想，可以直接写在天地角，可以写在徜徉之间；我可以换不同颜色的笔；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在旁边画一个小人——我真画过……你用笔书写的那种感觉，和你通过键盘，通过非常繁复的方式输进去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阅读其实是一个思想史的话题。阅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类社会和思想的深刻变化。反过来，阅读方式的变化，也推动着人类社会和思想的深刻变化。我们反思当下的阅读状况，我们知道，关于阅读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革命正在发生。电子阅读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到来。”

“书籍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世界。我们刚才所阅读的那些东西：星图、足迹、音符、花纹，它们背后实际上都指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些符号代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去了解那个世界。”

“我们阅读一部书，书的背后是世界，而阅读是我们人发出的一个行为。关于阅读演变的历史，其实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广义的阅读，其实就是认识人，认识这个世界，阅读这个世界。”

“阅读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你的收获来自两个方面：一，你阅读的东西；二，你的阅读行为本身。那么在这里，阅读成为一种仪式。我们把它总结为这四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切己。’这就是朱子读书法里所确定的一个古典阅读的读书范式。究其实质，是一种阅读的仪式化。循序渐进的背后就是一种书籍的等级制度，应该去读什么。熟读精思，提倡一种出声的诵读记忆。虚心切己，也就是把自己融会贯通到至高的那个传统中去。”

“古典阅读范式的提出有它的历史语境，它面对的是印刷时代的书籍泛滥，以及人和书的疏离。所以它会去提倡经典阅读，提倡一种仪式化的阅读，提倡诵读和抄写，在一个印刷时代恢复诵读和抄写，用传统的精神来规训现代前夜躁动不安的个人。”

“那么最能够代表古典阅读范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男性读者在书斋中端坐着，严肃地阅读，阅读的对象是儒家经典，那么，最能够代表早期现代阅读范式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女性读者，突破禁忌，极端情绪化地对禁书的阅读。并不是说所有古典读者都是这个样子，也并不是说早期现代读者都是女性，只是说这是最能够代表两种阅读范式特点的景象。”

“不管是手抄本时代，印刷本时代还是电子时代，人和书都可以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书籍的物质形态的变化，不意味着人和书就一定走向疏离……物质形态的差别会决定你的阅读的本身，会决定你对一本书的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对书籍的物质形态给予足够的尊重……我们还要注重阅读行为本身，不管是传统儒家那个仪式化的行为，还是金圣叹时代那个自我选择的个性化阅读的情景，都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确定，因为阅读行为本身也会影响到你对书籍意义的理解……我们要提倡保存丰富的阅读形式，从前我们是出声的阅读，公开的阅读，后来我们有私人的阅读，有默读，其实没有什么好和坏的差别。到了未来，我更希望看到各种更丰富的阅读形式同样存在。针对不同的书，在不同的场合之下阅读。你可以选择雪夜闭门读禁书，你也可以在清晨约上几个好友在一勺池边大家一起朗读……最后，我们要敬畏文字本身，因为这个是文字的时代。不管是手抄时代，印刷时代还是电子时代，它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文字本身，带有一种神秘力量。不管书的形态如何变化，文字是不会变的。那么，希望带着这些旧时代的价值，我们可以走向一个新的阅读时代。”

# 雲圖

## 历史与革命的路线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七届文学节系列讲座之“《云图》——历史与革命的路线图”于3月29日19:00在公教三教3105教室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该院孙柏副教授。

本次讲座中,孙柏老师以批判性的眼光深入分析了电影版《云图》与原著间的共性与差异,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深入分析了其中的三个不足之处。

在讲座的开始,孙柏老师从本次文学节的主题“回归阅读”谈起,他认为我们应摒弃为了“尊奉经典,膜拜权威”而回归阅读的思路,而应以重新回到语言文字这种思考媒介为出发点,体会语言文字领域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基于这一点,原著和电影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二者都可以开启思考空间,对我们被封闭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孙柏老师围绕自己对于《云图》的三个质疑展开论述,剖析其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引出对历史与革命的思考。

首先,《云图》一向被认为的最大的优点是其结构的复杂性,六个独立而存在一定关联的故事构造出了一个宏大的时空结构,在这种数据库叙事下,总体里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体现出了个别和一般、事物和理念的关系。而在孙柏老师看来,这样的叙事结构其实在《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这样的作品中已有所运用。但在《云图》的叙事结构中各个故事间的关联较为生硬,使得《云图》的所有事件更像是一种偶然性的发生,缺乏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孙柏老师认为《云图》的叙事是一种彻底失败的叙事。

其次,《云图》的故事中缺乏对特殊历史背景的展现。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历史是一种命定的世界历史的展开。《云图》却更像是一部伪编年史,各个事件中主人公被先天赋予了一种命定的去创造新人类的可能性,而这种联系是缺乏历史内容的。在《云图》的六个段落中,除去后两段的未来世界以及2012年这一时间点,前三个部分,1849

年的法国大革命,1951年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1973年的国际政经格局转型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节点。然而在《云图》的故事中这些特殊时段的历史背景却被淡化。以1931这一年份为例,在电影中1931年被改为1936年,在故事的叙述中,看不到欧洲战争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的故事中,整部《云图》虽然提示了历史时段但又悬置了历史事件。

最后孙柏教授认为《云图》还暴露出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就是对革命的刻意回避。在《云图》的故事中存在着反抗,然而所有的反抗都与革命无关。因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所有革命都是血腥的,暴力的,所以要抵制革命。这一观念使得“革命”成为了人类既要去面对而又无法面对的问题。《云图》中关于内索国的部分反映出了对现代工业的困窘的关注,展现出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底层和上层两部分。而在故事中主人公凭借一己之力进行的反抗正体现了当今民主制度下民众抗争的核心。

在这里,孙柏老师以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为例指出政治中往往重视个体和全部的关系,因此有一系列如凯撒这类象征性名字的存在。同样地,在《云图》中只看到内索国自由民的反抗,却看不到其他克隆人的被启蒙。关注凯撒而把奴隶阶层排除在外,与把法国大革命排除在外一样,是为了把暴力性的革命排除在外。孙柏老师认为当今时代,我们面临严峻形势,生活在崩溃,没有未来的边缘,此时需要的正是暴力性的革命,不是一己之怨念,因为暴力性的革命针对的才是体制本身。所以在解决人类性的问题上还是需要诉诸暴力性革命的。

在讲座的提问阶段,孙柏老师就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云图》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最后,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云图》——历史与革命的路线图”讲座圆满结束。

(本报记者:王亦琳)

外,他还提到了文学改编的三大基本类型:古典文学改编,近现代严肃文学改编以及近现代流行文学改编和两个繁荣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二部分内容和传播相关,即当文学作品转换为电影的时候的策略。常江老师通过结合相关电影片段的放映来详细生动地介绍了好莱坞完成文学作品的视听化的方式。第一种是蒙太奇技法,即通过镜头组接打破原著的时间线,可以创造出视听语言范围内的新意义,它在文学原著的改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蒙太奇技法既可以将文学作品一些独有的创作手法比如内心状态的描写,借助视觉的象征手段展现出来,也能够打破文字符号的限制,创造视听语言独有的意蕴。第二种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将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在好莱坞体制下塑造成典型的美国式英雄,输出至全世界。常江老师认为“好莱坞中英雄人物的特点是:首先是男性,其次在身体上要有性的吸引力,再次是有一些可接受的行为瑕疵(包括粗俗、玩世不恭、不遵从规则、有吸烟习惯、赌博、私生活不太检点),还有对理论的厌恶和对实践的热衷,有绝对不容打破的原则和底线,代表人物包括克拉克盖博、汉弗莱鲍嘉、马龙白兰度、罗伯特格伊洛等。”第三种是创造性地使用音乐和音效。他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声化蒙太奇是怎样营造更深刻的意义的:《2011太空漫游》中古典音乐的使用使古猿使用工具这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有了很丰富的意义;《美国往事》非常规音效的使用,使整个剪辑有了紧张感,让观众产生焦灼感;《发条橙》中的声化对位的表现方式,把声音和画面进行完全对位的处理,使观众产生一种难以说清的视听体验。常江老师还对视听化的本质进行了阐述:“首先将意义生成的路径缩短。视听符号是短符号,我们看图像比看文字生成意义的速度更快,所以当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以后,应该能使观众更加容易看懂。第二是能将抽象概念感官化。比如暴力,爱情,人性,恐惧,我们写在书里只有一个词,但拍电影时可以有镜头去表现它。第三是对人物做典型化的处理,比如说做性感化的处理,尤其是对女性角色做这种物化的处理在文学作品改编中是很常见的。男性角色,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男性英雄的形象通常都是很有性吸引力的。最后是强化受众的自我投射与身份想象,能够让受众通过看电影将自己想象成经典文学名著里的人物。”

第三部分是从好莱坞的文学改编传统和它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下中国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把中国文化状况和影视改编联系起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可供思考或者讨论的话题。常江老师首先探讨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或者说印刷作品有一种天然精英主义的倾向,电影则是天然民主化的倾向,精英主义和文化民主化之间是有一个对立的关系存在的,体现在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行动中。“尽管电影作为第八艺术的艺术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就是说现在已经不会再讨论电影是不是艺术了,但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却始终伴随着电影而发展,今天我们讨论的已经不是电影是否独立于文学这个问题了,而是要借助电影文学改编这个话题去讨论中国当代文化中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之间是不是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特征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专家学者也好,作为普通学生也好,怎样去应对这种状况?”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不应该忠于原著,常江老师认为,“这实际上是基于印刷媒介的精英文化和基于视听媒介的的大众文化对文化领导权之争,也就是谁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占据一个主流地位,那么文学改编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伴随着权力的,其实不存在百分之百忠于原著的作品。”常江老师以来高梅上世纪30年代拍的改编自赛珍珠作品的片子《大地》为例来说明权力所起的作用。《大地》完全是描写中国的作品,尽管当时好莱坞有大量的华人演员,但片中的中国人都是由外国人扮演的。除此以外,这种权力的作用也可以从电影角色中看出来。美国电影里面女明星的形象经常是和外国人联系在一起的,而男性的通常是美国自己的人,这种角色分配是对当时美国国际秩序的一种想象,美国代表男性主导型的英雄,而欧洲代表的女性角色是依附于美国的,这就是改编过程中一种想象的力量。

从好莱坞看中国,常江老师首先对比了八九十年代电影和21世纪电影的差别。80年代文人气质与政治表达是非常显著的,因此文学作品改编是非常讲究的,90年代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但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还在拍摄很多文人电影

来与消费主义进行抵抗。到了21世纪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缺乏对话机制,这在八九十年代是不存在的。接着常江老师提到了被改编的电影的几种类型以及存在的问题。“哪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呢,我们看,也是可以和美国相对的,第一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第二类就是现代严肃文学作品,如《红高粱》、《妻妾成群》、《白鹿原》;还有就是流行文学,如《杜拉拉升职记》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但不管怎样,在中国电影史上缺乏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改编时代,尽管它伴随着电影发展的始终,但缺乏一个时代让我们认为文学改编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缺失,即中国电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滋养。文学改编为我们观察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忠于原著目前还被很多人认为是重要的标准,那意味着文化的评判还具有着保守的倾向。中国的文学改编比较侧重于视觉的奇观化,对于文本意义的发掘是非常不够的,尽管有一些很好的电影,比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并没有对意义进行发掘,只是对小说中的可以被呈现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奇观化的处理,这种视觉呈现成为第五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砝码。还有就是古典文学改编领域出现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比如说西游系列,尽管大家看了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实中国电影缺少的就是这种对古典文化进行多元化的尝试,使古典文化的营养能真正受惠中国电影,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大宅院的呈现,还有《霸王别姬》对旦角的呈现,其实都是对视觉奇观的处理,对于电影本身我们解读不出超越电影之外的其他意义。对于《霸王别姬》我们得不出不同的意见来,我们看《现代启示录》却能得出很多不同的意见来,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导演并没有从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比如说《白鹿原》,它对于奇观的呈现已经到了一个色情化的标准。”

最后常江老师对大陆电影应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见解。“目前我们的大众文化领域体现出明显的后现代倾向,第一我们没有独立的权威的评判机构,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这些报纸的影评人对电影的生死基本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的影片可能一开始只能在一些艺术类剧院上映,但经过影评人的挖掘,就能在剧院上映”。他认为一个独立权威的评论界是有这个力量来很好地引导大众的审美趣味的,而我们国家不存在这种机构。“那些所谓的权威影评,除了网友写的,其他全是拿了钱的,影评人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除了评判机构存在问题之外,大众也存在一种狂放的倾向,每一部电影出来以后,要么是爱得要死要么是恨得要死,缺乏一种理性的启蒙意义上的关照”。大陆电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政府可以干预文化的生产,惟票论的情况现在也很普遍。“美国的观众没有人会因为电影的票房好而认为它好,但中国,不管是研究电影的人,还是看电影的人,做电影的人,都对票房数字十分敏感,一部电影上了十亿,大家就像过年一样,但其实际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没有从这个电影文本本身得到任何意义。”第三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也出现了趋同,缺乏判断的独立性。常江老师最后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来总结他的基本观点:“点出一个地狱,固然不能彻底明示我们如何去拯救地狱中的众生,或如何减缓地狱中的烈焰。只不过,承认并广泛了解我们共有的寰宇之内,人祸招来的几许苦难,仍是不无裨益的”。他以此来告诫大家一定要对当代文化的宿命保持一种敏感,保持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的悲悯之心,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走向更好的辉煌。

(录音整理:冯海敏)

# 好莱坞电影的文学改编传统

2013年4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回归阅读”第七届文学节系列讲座第五场——“好莱坞电影的文学改编传统”在公教2102教室举办。新闻学院常江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学盛宴。本场讲座主要围绕三个部分进行。

常江老师一开始没有直入主题,而是从湖北卫视即将进行二轮独播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入手,谈及了这部电视剧是否应该修改结局这个争议以及张纪中、于正两个制片人对于改编的不同观点,从而引出了“尊重原著是不是应该成为判断影视作品品质的标准?如果说一部影视作品改编自文学原著,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观众会对这件事情作出高度相似的反映?”等一系列问题,引导听众对文学改编的思考。接着常江老师引领听众进入

好莱坞这一全世界最大的影视生产基地,通过它来折射中国当代的影视问题。

讲座的第一部分是西方文学在好莱坞进行电影改编的历史和现状。常江老师对美国电影协会1998年评出的美国过去的一百年中拍得最好的一百部电影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文学改编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得出“评论界的视野内,电影的品质越高,文学改编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可以看出美国电影评论界主流对文学作品改编的基本态度”这个结论,又从各大电影奖项的设置上分析美国评论界对文学改编重要性的重视度。常江老师认为文学改编在好莱坞的基本特征有三个:首先在好莱坞生产的优秀电影中,文学改编作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第二,在经典的影片当中,文学改编占据了半壁江山;第三,热衷于文学改编的电影导演,很多都有欧洲的文化背景。此

